

**不存在的島嶼**

**有人提起毛利先生**

## 有人提起毛利先生

毛利之俊在花蓮住過一段時間，他在報社工作，頭銜是「主筆」。有一天，他突然辭職，根據他個人的說法，離開是出於無法抑制的渴望。

在花蓮港這座稚嫩的濱海小城，除了一本碩大而沉重的《東臺灣展望》，毛利先生沒有留下更多經得起考據的足跡，對於多年後有意認識、了解乃至與毛利先生結交的後人，彷彿一只特大號跳箱，沒有人跳得過。僅僅八十年，毛利先生早就昇華成一個無解的謎，再也沒有人知道他哪一年踏上比少女的乳房更青澀的花蓮港街，沒有人可以指出他住在大街春日通、靠近海邊的入船通還是臨海道路進入市區後接著的筑紫橋通，他是否加入「東臺灣聖地宣傳會」的鼓吹行列，跟著有頭有臉的仕紳「行銷」花蓮港，更是毫無線索。

唯一確知的是，昭和五年冬天，毛利先生倉促退下編輯台，從冬天不怎麼冬天的花蓮港奔向可以說沒有冬天的臺東。他在臺東十分活躍，熱心地方事務，名字偶爾會出現在全島性大報「臺灣日日新聞」，就算毛利夫人辭世那樣與世人無關的消息也躍上報端。毛利先生是何等人物，從那些可有可無的通訊或可窺得一二。

講到毛利先生，不能不提到橋本白水。橋本白水是大正至昭和初年十分活躍的文人，一個高度仰賴媒體關係的「小知識份子」，看起來愛臺灣，但他和許多眼界心胸都稱不上寬闊的日本人一樣，心目中的臺灣不是「臺灣」，而是「日本帝國・臺灣」。橋本白水在《島の都》一書中將當時人口排名「帝國」第十位僅僅十六萬甚至少於朝鮮京城二十五萬人的臺北講成「グレート台北」（大台北，Great Taipei 是也），描述的情景大部分卻侷限在臺北城內，而且還是日本人平常走動的小地方，例如萬華，他只描寫日本人愛逛的「遊廓」（妓院）。橋本白水是一個「好人」，也就是說他是一個典型的遲鈍日本人，支持帝國主義者其中不少就是這一類「好人」。

封閉而驕傲的「小知識份子」性格似乎不是橋本白水一切作為的唯一指導。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他以記者的身份來到東臺灣，和當時的花蓮港廳廳長飯田章鬧得不太愉快。眾人皆知，飯田章對記者向來不甚友善，來自「島の都」的橋本白水言談間或許流露了某種優越，兩人一言不合，似乎也不至於令人感到意外。對手雖然是一廳之長，橋本白水卻不示弱（這是小知識份子性格的另一面嗎？），經常在他主持的雜誌找機會修理飯田章。

為了追蹤報導，橋本白水不辭辛勞頻頻進出東臺灣，因此結交了不少朋友。「不打不相識」，橋本白水和飯田章「打」起來，卻沒交成朋友，他結識的都是與衝突不相干的人士，其中一個是警察出身的江口良三郎，後來執掌花蓮港廳，另一位是花蓮港街長梅野清太，人稱「東臺灣總督」，出身聲名顯赫的賀田組，同時兼任東臺灣新報社社長，也就是毛利之俊的老闆。

比起臺北，橋本白水似乎更關心東臺灣。江口良三郎對此頗為感動，於是在廳長任內聯合橋本白水和梅野清太籌組「東臺灣研究會」，以「東部的索引者」為目標，按月出版《東臺灣研究叢書》，這份名為叢書其實更像雜誌的刊物一直發行到橋本白水過世為止，總共九十七期，從未間斷。如果梅野清太配得起「東臺灣總督」這個稱號，則橋本白水應該可以說是大正昭和年間最具份量的「東部通」，他對東臺灣不乏獨到的見解（這和他某些著作透露出來的性格不太一致，似乎反映了他另一面的性格），《東臺灣研究叢書》不只是一個讓他大發議論的舞台，也是讓他快速了解東臺灣的管道。

由於任職於東臺灣新報社，又因為社長的緣故，毛利之俊想必和橋本白水有所往來。昭和五年夏天，橋本白水寫成《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其中花了一點篇幅評論臺灣的「言論界」。對於《東臺灣新報》，他如此描述：

「東臺灣新報」於大正五年獲得許可，是本島『四日刊報紙』之一，具有活躍於西部的實力，隨時都能輕易進軍外地。高層與社長並非靠「報紙」吃飯這般貧弱，是真心為了東臺灣的開拓而出資，也就是說，現在不靠報紙吃飯的，只有此「四日刊報紙」的社長梅野清太，而主筆毛利之俊以下的編輯員，像現今記者頻吹搬風的人物，一位也沒有。

在他筆下毛利先生顯然是東臺灣新報社的要員，或許頗為資深，才有份量穩坐「主筆」之位。這樣一位輿論界的要人閃辭他去，引發揣測是必然的，雖不至於淪為八卦，傳言卻免不了，直到現在我的小城仍流傳著幾則關於毛利先生的軼事，真假難辨，日後也不可能獲得證實。

即使如此，有人還是窮追不捨，企圖翻出毛利先生的行跡。他們的舉動看起來像挖掘恐龍腳印的古生物學家。這一群狂熱分子之中有幾個年輕人自稱熱衷文史研究，經常出沒於市區俗稱「金三角」的鬧區，那裡離曾經存在的東臺灣新報社僅僅幾步之遙，一有機會，他們就黏著幾個年歲近百的老先生，聽老先生把幾十年前的老事從颯遠的風中抓回來。他們表現得彷彿在搶救某種瀕臨滅絕的動物，積極而激動，但也就是那樣的熱情令人覺得看不見的往事好像比絕種的動物更虛幻。

小城的市民平時忙著切身相關的事情，對滅絕中的動物通常不太有感覺，多數人不把比《東臺灣展望》泛黃脆弱的紙頁更脆弱的往事當成一件事也就也不奇怪了，這沒有好壞對錯，而且一點也不費解。相較起來，那幾個年輕人的表現就顯得突兀了，他們努力裝孫子扮孫女，使力召喚老先生異常清晰但隨時可能斷訊的記憶，企圖從中抽出毛利先生在花蓮港活動的線索。希望微渺，他們知道，但只要挖出一、兩條蛛絲馬跡也就值得了，因此，當他們得知有人戰後竟然仍與毛利先生維持聯繫，驚喜之情按耐不住徹夜飲醉也就不難理解了。

那群長壽人士熬過颱風地震，捱過各式各樣的人造災難。關於毛利先生，其中一位老先生的說詞最勁爆，聲稱曾為毛利先生跑腿，也就是採買、寄信之類的瑣事，偶爾應要求私下探聽某些消息（聽起來像線民）。毛利先生離開花蓮港後，音訊斷絕，直到戰後三、四年，時局宛如傾搖翻覆的舢舨，有一天郵差送來一封信，信封署名毛利史郎，寄自大阪，收信人寫的是老先生的漢名，收信地址卻是舊時番號，老先生又悲又喜，光看信封就要掉淚了。最令他驚訝的是筆跡，他不知道毛利史郎是誰，他認識姓氏為「毛利」的人只有毛利之俊（由此看來，老先生多半沒有見過《東臺灣展望》，書末自序毛利先生的署名正是「毛利史郎」）。信封上的筆跡似曾相識，但「史郎」讓他感到陌生，像一早醒來忽而記起的夢境。

真的是毛利先生嗎？

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信讓他與毛利先生連絡上了，此後兩人一直維持聯繫，回信、寄信、等信、收信、回信，一年往返三、四回，有時老先生會額外收到大阪土產的「お菓子」。有一次毛利先生提到惠比須屋，委婉問及安富先生的餅店是否安好，至此老先生徹底相信來信之人必是毛利先生，不可能是其他人，他常常替毛利先生跑惠比須買「餡子芋」，一種只用番薯不用麵粉卻有餅皮的和式點心。於是再來每一次回信，老先生都會附上一把餡子芋，茅草包束，就跟毛利先生記憶中的一模一樣，毛利先生甚至說連草香也沒變。老先生和毛利先生通信長達十年，吃了不少飄洋過海的日本菓子餅乾，有一天，他忽然想起好一陣子沒收到信，從那一天起，他再也沒有收到大阪來的信件とお菓子。

對我們的年輕人而言，老先生無異人間國寶，從他嘴裡挖出寶物比從立霧溪撈到黃金還興奮。後來他們聽得的故事之一是：年輕的毛利先生出入花屋敷、貸座敷之頻繁不亞於進出編輯室，酒足飯飽之餘往往另覓更有趣的場所繼續為歡作樂。老先生神清目明，記得不少往事，雖然我聽的都是年輕人的轉述，卻也興味十足，那些故事裡洋溢著一個帝國殖民地文人的浪蕩瀟灑，還有一座邊緣小城成長爆發的景況。彷彿夢境似的，我不是那麼相信我的小城曾瀰漫著一股拘謹的狂浪放肆，那就像正在開展的青春。年輕就是美好，這是鐵律，的確如此，我從那些二手故事看見女侍濃濃的妝容，聞到誘人的氣息與滿桌酒菜在包廂混合滯留的

氣味，聽見三味線一顆一顆獨立如豆的樂音。

往事啊，老先生的記憶令人讚嘆。

故事精彩有趣，卻帶著淡淡的陰影，為此我頗感困擾，摸不清到底哪裡出問題。似乎一開始就出了錯，像一座堂皇壯觀的劇院把地基打在一片沼澤上，無論如何看起來就是歪的斜的。後來我在整理雜物時翻到一張壽宴請柬，想起老先生去年才風風光光過了九十大壽，兒子女兒在門前的馬路上搭棚擺桌，佔去整條慢車道，外加三分一快車道，如果不逆向越過雙黃線，汽車根本過不去，賓客盈門，人來人往的中華路因此變得壅塞不堪，抱怨四起，偶爾可以聽見幾聲訐譙。我的中華路就是毛利先生的高砂通，無論昭和五年、民國一百年還是二〇一四年，同一條路沒有變得更寬，兩旁的店面住家比堡壘還固執，毫無讓地拓寬的意思，只是日日月月年年，比起高砂通，中華路真的顯窄了。言歸正傳，高砂通和中華路的寬窄不是重點，重點是老先生去年九十歲，算來他出生於大正十五年，也就是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年，如果按照臺灣漢人舊例來算，毛利先生離開那一年他才六歲，六歲，一般人還沒學會款理生活大小事的年紀，一個那種年紀的猴囡仔怎麼可能替為一個成人跑腿辦事，又怎能結交身擁輿論影響力的殖民地報社總編輯，後來還維持了多年的交情？

在回想爬梳這些瑣事以前，我已見過毛利先生，跟著他走了一趟他的花蓮港廳。在繼續記下他的旅程以前，我決定把市井傳言放一邊，暫時不理會，儘管花花故事多采多姿，實在讓人很想多聽一點。

當然，我不會探問那些故事是真是假。

# 紀念冊

## 紀念冊

關於毛利先生，可以確定的不凡事蹟只有一件。昭和七年，毛利先生窮一己之力（但可能不是窮一己之財力）編撰《東臺灣展望》，文圖兼具，而且分量相當，那不是一本遊記，也不是攝影集，如果一定要分門別類，我寧可說那是一本特別的「類寫真帖」。他帶著攝影師，從蘇澳開始，走上清水斷崖的腰腹，深入太魯閣峽谷，踏進奇萊平野，貫行中仙道，橫探三大越嶺道，直抵中央山脈的稜脊，再隨秀姑巒溪切穿海岸山脈，最後從奚卜蘭縱走海岸線回到花蓮港，接馬不停蹄展開臺東之旅。就在這一趟匆促卻全面的旅程中，東臺灣的山川人物第一次系統性地進入鏡頭。

在緊湊的奔波之途中，毛利先生取得一千五百張照片，在那個沒有「快閃記憶體」甚至連「快閃記憶體」這個名詞也不存在的年代，毛利先生和他的攝影師完成的無疑是一項難以匹敵的成就。那時照相機仍然笨重，Nikon 不久前才以「Nikkor」為名發表第一款相機鏡頭，Konica 剛剛推出「櫻花」膠片，改變攝影史的 Kodachrome 還沒有上市，如今知名的 Fujifilm 和 Canon 根本連影子也沒有。

毛利先生結束旅行後，立刻帶著文圖前往大阪，三個月後《東臺灣展望》問世。身為一個業餘編輯，我大致估算得出那樣一本厚重的大書會花去多少時間和心力，從文圖配置、編排設計到最後的印刷裝訂，甚至運送，三個月並不很充裕，如果中途校訂再三，編輯不得不配合修改，時程一定更緊。還有，那是一九三〇年代，要完成一本書在許多環節上不得不仰賴手工，譬如文圖編排，這就意味著謹慎、決斷和專注，以及和電腦時代比起來更長的工作時間。我們可以大膽斷言，毛利先生滯留大阪期間，一定沒有花太多時間吃吃喝喝或者上酒家作樂，大概也沒有多餘的心思在古城走走看看，而是把全副心力貫注在他的「展望」之書。

書成之後，毛利先生讓那些重現於紙頁的東臺灣風光再次渡海，回到「自己的地方」。對當時的臺灣東部甚至整個臺灣島而言，《東臺灣展望》都是一件大事（如今看來仍是一件大事）而《臺灣日日新報》隻字未提。那時，在我們小巧繽紛的島嶼，從來沒有一個「個人」以近乎「普查」的角度去觀看一個個別的地區。來自一個年輕的殖民帝國（比起荷西葡英，日本的帝國殖民史實在太資淺）的毛利先生，若非對十八世紀歐洲製圖師筆下「鮮為人知」的東海岸懷著難以形容的愛意，不然就是肩負某種特別的任務，一個必須把東臺灣走透摸熟的任務。

《東臺灣展望》的版權頁註明「非賣品」（毛利先生說那是一本送給鄉親的

「紀念冊」），既然不是商業發行，刊行的數量想必是有限的，或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完好留存至今者——若不計公部門如圖書館的典藏——頗為罕見。毛利先生首先將書送給「東臺灣曉聲會」的會友、給予支援的官方單位、團體與個人，或許還逐一贈予刊登廣告的商家做為謝禮兼收據（書末有廣告十來頁，超過一百三十個廣告主，食衣住行、育樂醫療、電氣保險……，品項繁雜，應有盡有，即使要應付需索甚甚的現代生活大致上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重要的是，那些廣告讓我們看見當年小城小鎮的經濟樣貌。我們當然可以實事求是、吹毛求疵地小小地納悶：那些商家怎麼會買廣告買得那麼踴躍呢？只要記得毛利先生的履歷，想起幾年前他手握地方輿論大權，那麼一切就不是問題了）。

在狂熱戀舊分子眼中，《東臺灣展望》是一本不世出的「天書」（純粹字面意義的），一則比最奇幻的傳說更奇幻的神蹟，而神蹟往往會找上不很虔誠的信仰者，譬如我。

輕度颱風蘇力從東北角輕輕掠過（順帶一提，直到日本人差不多都遣返了的一九四八年，颱風在臺灣才開始有了名字，一開始是伊瑪、萊莉、歐梅莉和凱密拉等等聽起來最好別惹上的女人，後來加入韋恩、馬克、亞伯……，一九九八年颱風委員會——聽起來像颱風組成的委員會——決議屏除詛咒般的名字，從此臺灣的颱風正式加入國際社會。首先，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國家或地區十四個颱風委員會成員分別提供十個名字，再由位於東京隸屬世界氣象組織的區域指定氣象中心從五組每組二十八個共一百四十個名字中依序命名，於是颱風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動物、植物、星象、地名、神話人物或者珠寶。毛利先生那個時代的颱風比較樸素，從昭和五年到昭和七年，他經歷了颱風B一三四至B一四二），我和毛利先生的濱海小城度過了一個不常見的颱風平安夜，滿天烏陰隔天就變回亞熱帶七月該有的樣子，天空用力刷過似地又藍又清朗，海上偶有長浪的餘緒，但一樣蔚藍無匹，太陽高掛。

我在沒賺成颱風假的懶散天走進圖書館，拖著沮喪的腳步下樓。辦公室裡一個人也沒有。我懷疑新聞台跑馬燈的停班停課名單漏了我的小城。正在遲疑之際，隔壁參考室傳來輕輕的擦響，聽來似乎是七彩塑膠掃把摩擦大理石地板的聲響，隨後就看見萬年館員老章提著拖把走出來，髒水跟著在他走過的路上滴出一條線。

一進參考室，涼風陣陣，飽含水氣，本來就陰冷的參考室更陰冷了，寒意四起，比颱風天更有颱風的意思。十幾台風扇很有秩序地穿插站在書架與書架間（後來我和老章從倉庫翻出三部工業用風扇，不曉得什麼樣的文化活動需要那種風扇，不過馬力倒是十分充沛，轉起來勇猛威武），早到的同事有的掃水有的拿拖把吸水，有的從小窪般的積水處將水盛起倒進垃圾桶，看得出來人人有氣無力，

怨在心裡口難開。其中有些來自其他部門，讓我這個看管參考室的感到過意不去，只好快步加入復原的行列。

災情其實不嚴重，只漫了一層粉底似的薄水，至少免去傳說中某年強颱風淹文化中心引起的疏散大戰，不用全體總動員，不用到處調手腳。二十分鐘後，我謹慎、溫柔且充滿謝意的請諸位同事回座，一人攬下善後工程，攤開抹布跪下來把書架下方清理乾淨，直到中午才逃脫一跪一爬的夢魘，來來回回總共清掉五、六桶髒水。連續幾個小時的苦勞令腰椎僵直難伸，我從南北向第三排書架底下拉出抹布那一刻，大大吐出一口氣，乏力地靠著冰冷的鐵架，有時肩背免不了碰到那些貴重的書籍，只要一碰到我就立刻縮回，免得傷了書。

參考室的工作相當容易，比大樓警衛管制進出還輕鬆，只要不讓書跨出門口便功德圓滿。每逢年度盤點，我總是第一個交報告，從無差錯，藏書的數量只有增沒有減，只要在報表最後一筆之後鍵入該年的新增書目就可以交差。沒有人可以從參考室夾帶任何一本書而不被我攔下，但似乎也從來沒有人試過這種既高尚又齷齪的舉動。

除了整套整套的叢書，多數書本尺寸不一，凹凹凸凸，整理起來很麻煩。其中一本特別突出，書架承板深一尺二還容不下，壯碩的尺寸讓我印象深刻：棕黑布面精裝，書背嚴整方正，沒有書名，沒有圖案，只是一片深褐。從外觀根本猜不出那是一本什麼書，我也從來沒想抱下來看看。天天進出書庫，卻毫無興致翻覽，當然不太能體會把書當成寶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境界。但我真的對那一本大書有印象，記得它擺在哪一座書架的哪一層，它緊貼架壁的樣子像個流浪漢，縮在擁擠的街頭，除了身材，沒有其他引人之處。

而我正癱坐在它旁邊，足足十分鐘，或許更久。

腰痠一直持續，沒有紓緩的跡象。

從我動手清理開始，參考室便無人進出，四周安靜得像用書陪葬的古墓，扇葉呼呼轉動的聲響讓整間參考室顯得更寂寥。水氣仍然潮重，外頭近午的高溫彷彿是某種催情劑，涼涼的空氣愈來愈暖，水氣也開始蒸離地面慢慢飄升。

我第一次替日日為伍卻不相識的書本感到擔心。濕氣將如邪靈附身，纏覆封面，時日一久滲透入內，纖維將腫脹變形，塵埃得以沾黏，在時間的催化下，微量的酸甦醒過來，脆化將如惡細胞蔓延橫行，褐斑出沒如老人斑，外國人名之為 *Foxing*，聽來像舞動的狐狸，隨處留下腳印。

再漂亮的書總有一天會粉碎。太糟了。我忽然對那本書感到好奇，到底寫了什麼，書背的另一邊藏了什麼，還想看看它是不是已經染上褐斑，那些古舊的紙

張是不是和老人鬆脆的骨頭一樣易碎。

我戴上手套，一手扶著書背，一手伸進書架，輕輕把書往上往外提，再謹慎地抱出來。燙金書名嚴肅地盤踞在棕暗的封面中央，不符潮流地由右至左排成一列，像一支火赤的烙鐵，帶著嗤嗤聲刺來，「東臺灣展望」；右下角另有幾枚小字，「紀元二五九三年」。

對我來講「毛利史郎」不再只是傳說中的名字，而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外國人？還是同胞？在我祖父的年代，他和毛利先生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我認識農夫、漁夫，還有教師和公務員，多數人樂意做單純的人，一點也不想聽見關於臺灣人、日本人還是中國人的喋喋爭論）。

只是一個處在特定情境的「人」。毛利先生一定也這麼想，才會在這本「紀念冊」寫上「超越」世界好幾百年的日本紀元。